

# 袁小修私人写作中的生命意识

李远达

(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, 北京 100871)

**摘要:**生命意识是近年来文学与心理学、社会学交叉研究的热点话题,而日记这种独白文体因其私密性,能够更好地反映作家的生命意识。明末公安派殿军袁中道在其日记《游居柿录》中,集中表现了其对疾病、死亡,以及轮回与聚散的感慨,视角独特,在同时代散文中堪为代表。袁中道私人写作中呈现出的毫无掩饰精神痛苦,在此前的文学传统中是不多见的。究其原因,除了公安派“性灵”主张外,最根本的是在晚明“王纲解纽”的末世之中,有志士人的普遍困顿与抱负难伸。因此,《游居柿录》不仅可以作为研究晚明士人精神生活史的一手材料,而其中所折射出的文人之厄,时至今日,仍有意义。

**关键词:**疾病体验;死亡叙事;因果轮回;聚散兴亡;文人之厄

**分类号:**I207.2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673-1395(2018)03-0045-06

生命意识是文学永恒的核心主题之一。“人事有代谢,往来成古今。”时光的流转,生命的消逝,自身的穷达,历史的兴亡,这些无不波动古人那敏感的神经,又与其易断的柔肠有着某种天然的亲缘关系。生命的价值在哪里,意义又是什么,构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,存在于历代文人心中。这一主题或显或隐,历百代而不衰。每当王朝后期,社会混乱,禁锢松弛时,人们对生命主题的真实体认,便会集中映射到一代士人的文学作品里去。身处“王纲解纽”的晚明时代,湖北著名的公安三袁之一的袁中道,在他的日记《游居柿录》里所表达的,正是多角度多侧面的生命意识。

关于日记这一私人写作文体的特性,前贤已有许多论述,周作人讲得颇为周详。他在《日记与尺牘》中说:“日记与尺牘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,因为比别篇文章更鲜明地表出作者的个性。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,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炼,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。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,日记则给自己看的(写了日记预备将来石印出书的算作例外),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。”<sup>[1](P97)</sup>读小修的《游居柿录》,如同陪伴他走过十年光阴一

般。这十年之间,小修不仅备尝丧失亲友之痛与困顿场屋之苦,还经历了一次东游,两次南归,到过齐鲁与金陵,走遍大半个中国。如此广阔的空间位移以时间为线索记述,字里行间氤氲着一股浓烈的感伤情绪和生命不可把握的悲凉无奈,读来真切自然,毫无矫揉造作,因而感人至深。小修的生命意识,在《游居柿录》中具体表现为对四种生命困境的应对与回答。

## 一、多愁多病之悲

小修一生坎坷,多愁多病。个中原委,其仲兄亦兼文学上的引路人袁宏道是再清楚不过的。早在万历二十四年(1596),袁宏道在为小修的诗集作序时说道:“盖弟既不得志于时,多感慨;……而沉湎嬉戏,不知樽节,故尝病;贫复不任贫,病复不任病,故多愁。”而这年小修只有26岁。伴随小修一生的多愁多病,满腹牢骚,对他的身体显然是一种折磨,其享寿不永亦与此有关,然而“文章憎命达”,一身多病,困顿场屋,发之而为诗文,便会“每每若哭若骂,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”<sup>[2](P187)</sup>,且更易成为好文章。一个人对自身疾病的认识与描摹,不只是技巧纯熟

收稿日期:2017-11-03

基金项目: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(17CZW026)

作者简介:李远达(1987-),男,河北唐山人,博士研究生,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。

便能感人,亦必有浓烈的生命体验的灌注方才算得上好文章。让我们来看看小修自述疾病的文字:

脾胃不佳,少食即饱。身常汗如注,忧思郁郁。午后,忽大吐带血,予叹曰:“男子血如金,岂堪常吐耶!”颇有性命之忧,医亦错愕。吐后热不可忍,口渴如炙。甫食少许汤,即吐;甫吐,又复见血。就枕不能睡,则起坐;坐又不支。出帷绕床行,行复倒卧病榻。卧东复移西,西复移东。微闻医低声语人云:“却不宜见血。”又有人云:“有子否?”予时热无可奈,自思人生死是常事,但得便死即好。如此壮热,此体不知经几番烧灸,始就后世。生平种种,不知节量,今日身受此苦,何人可分,何法可解。复起,绕床行,热愈甚。鼻息出入不迭,上下气不属。渴极无法可救。僮仆皆袖手浩叹。久之,额间有微汗,渐安。……夜,带汗卧。梦中昏昏,苦甚。<sup>[3](P1161~1162)</sup>

这段记载,是小修在东游途中忽发火症,病势沉重,几乎丧命的真实记录,也是《游居柿录》中第一次大篇幅地记载小修疾病的发作,为他后来缠绵不断的疾病伏下了病根。“微闻医低声语人云:‘却不宜见血。’又有人云:‘有子否?’”轻描淡写的一笔,就勾勒出周围人张皇失措的情形,渲染出紧张的氛围。“有子否?”儿子,是养老送终之人,病时寻子,则可见病情之重。背着患者“低声”询问,则更突显旁人对病情的不乐观。仅仅三个字,就将小修病势沉重,恐将不治的情形描绘出来。有趣的是,在中国诗文传统里,描述别人为自己预备后事,却不常见。小修因此“自思人生死是常事,但得便死即好”。这种宁愿速死的深刻感慨,看似有悖常情,实则合乎情理,相信没有亲历过重症的人是无法说出的。在小修日记中,“求生不得,求死不得”成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话头。他甚至说出过“当病热极时,一刻也难度,若有人来刎喉,真笑而受之耳”<sup>[3](P1162)</sup>这样的话来。其对自身疾病痛苦的刻画,可谓力透纸背,入木三分。然而,如果仅仅是出色地描摹病痛,无异于高明的医书或《劝世良言》。小修更善于归纳病痛之原因,极具释、道两家风味。他说:“数日内,勘破世间种种繁华快活事,毕竟是刀尖上蜂蜜,沾着便不好。又如甘露内毒药,暂时虽可口,一日毒药发作,便要裂肠破肚。”精通禅理的小修自然明白,如他平日那般饮酒纵欲,尽情享受人间种种繁华,自然是透支生命,如同舔食刀头的蜂蜜,饮下甘露中毒药一般。经此一病,小修懂得了疾病之可畏:“我学道十七八年,止今

才有几分怕生死,才知生死海中,头出头没,出房入房,生老病死,一一要身受。奇痛极楚,转盼即至,可畏可畏。”更为可贵的是,小修在病中就已想到病愈之后,具有较强的自省意识和“以志吾过”的勇气。“古人云:‘如经瘴毒之乡,水也不得沾他一滴,要须十分防护。’我此时病新起,道心较急,看得极其亲切。只恐后来忘却,因书之于此。但忆前日呕见血时,热极时,求生不得,求死不得时,即无处不是快活日子也。”<sup>[3](P1163~1164)</sup>在极其病苦之时,能辩证地看问题,也就得到了“无处不是快活日子”的感悟。可见小修是具有豁达乐观精神的。生活之病苦与不幸固然可畏,但生活的本来面目便是如此,何如苦中作乐呢。由此可见,“以苦为乐”亦是《游居柿录》的一个常见命题。

多愁也是小修生命意识的一个面相。科举不利,功名晚就,对这位少年天才来说,无疑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刺激与讽刺。他的日记中时时流露出因科举失利带来的韶华易逝之感。如《游居柿录》卷三云:“如我辈名根未断,连年奔走场屋,今已四十,头发大半白矣,得来受享,亦无几时。况受享种种,俱是我所说锋刀上蜜,甘露毒药,何快之有。”<sup>[3](P1165)</sup>科举上不得志,极大地影响了小修的心境,更影响了小修中年以后的生活质量,使他对时间尤其敏感,故而发出“得来受享,亦无几时”的感慨。至于“锋刀上蜜,甘露毒药”,在小修笔下亦是常见,相信即使无甚快乐,小修也依然会追求,此本就是愤激之词。相较此时的牢骚,小修登第之后的感慨,则更为复杂,也更耐人寻味:

二月廿七日放榜,候报久不至。日已升,得中式捷音。予奔波场屋多年,今岁不堪其苦,至是始脱经生之债。亦甚快。但念老父及两兄皆不及见,不觉为之泪下。<sup>[3](P1359)</sup>

万历四十四年(1616),小修终于得中进士,然而此时,他的父亲和两位兄长都已先后辞世。中式连捷,自然不免“甚快”,后面几天的日记里提到夸官于太学,也写得颇为得意;然而笔锋一转,想起老父与两兄皆不及见,“不觉为之泪下”。正如前人所言,小修是袁氏三兄弟中最“热衷”功名的一位。在他笔下,功名不就之苦也最痛切,然而我们必须理解,与两兄相比,他的仕途太过不顺遂了一些。46岁才中进士,他的两位兄长都没有活到这个年岁!他的“热衷”里恰恰表现了一种通达。如考完之后他的感慨:“三场已毕,一身惫极,第与不第不可知,思了此一局,或仕或隐,当别有计也。”<sup>[3](P1358)</sup>当得知殿试“名

次在“三甲后”时，他笑着说：“得了头巾债足矣。”<sup>[3](P1361)</sup>这种苦闷中的乐观，恰恰是一种积极的生命意识。

多病多愁使得小修对生命的消逝更加敏感，很自然地想到了养生。他的日记中描写过一位95岁才去世的老绅士，也并不知晓养的道理，只是很少责怪别人：“是日，城内丘公卒，得年九十有五。公举前丁未进士，为吴江令，入为礼垣，以重修兴都志，永陵甚眷之。不数月，为少宗伯，几相矣。会永陵上仙，遂罢归。初不知养生，但少嗔耳。有少子年十二三岁，尤奇事也。”<sup>[3](P1141)</sup>小修在《游居柿录》中多次提到养生之理，如：

惟近来入舟，一月中不饮酒。夜饮数杯卧，脾胃调适。人见我居舟中，不知舟中可以养生，饮食由己，应酬绝少，无冰炭攻心之事。予赋命奇穷，然晚岁清福，延年益算之道，或出于此。不然，常居城市，终日醺醺，既醉之后，淫念随作，水竭火炎，岂能久于世哉！故人知我之为逍遥游，不知其为养生主也。近日精神爽健，百病不生，甚以自幸，留此幻躯，尚有别事可作。因喜而缕缕书之。<sup>[3](P1144)</sup>

这段话道出了小修的愿望，当然也道出了养生的妙绝。“精神爽健，百病不生，甚以自幸，留此幻躯，尚有别事可作。”养生以存常年，拓展生命的长度，是面对生命主题时小修给出的第一个答案，也是人们最容易想到的答案；而“人知我之为逍遥游，不知其为养生主也”一句，则可视为整个《游居柿录》所要表达的核心：小修的游居生活，不仅是地理空间观念上的极大拓展，更是时间维度上的一次深入开掘——面对生命的短暂与易逝，我们应当采取何种方式应对，规避抑或应接。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，同样摆在四百年前的小修面前。

## 二、亲亡友丧之痛

生离死别，本来就是人生的一大转关。面对死亡，尤其是亲友的离去，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态度，可以是庄子“鼓盆而歌”式的狂放，可以是渊明“死去何所道，托体同山阿”式的旷达，可以如东坡“十年生死两茫茫”那般深情，当然也可以如袁小修“肝肠寸断”呕血几死的痛彻心扉。

小修同胞共三男一女，长兄伯修、次兄中郎先后早逝，中郎死后两年，老父去世。小修在《寿大姊五十序》和《游居柿录》中，多次表达了同胞早卒，贫病无依的感慨。日记中对其兄长袁宏道从病重到去世

的记载历来为人所重，甚至有医家据此推测中郎死因，可见记述真实，非亲自侍疾不能有此详尽周全。请看小修万历三十八年(1610)的日记：

八月二十二日，……中郎火病渐加，迎一老医李姓者，年八十余，切脉曰：无病，意稍安。……二十四日，中郎火病不退，心甚皇皇。二十五日。中郎火病益甚，遣人迎邑中陈医。二十六日，陈医至，切脉曰：无病。独予私忧之，而人颇有笑予张皇者。……二十八日，病未见痊，足不能行。日中差可，夜殊不安眠。大便下紫血块，小便初如陈米泔水，后赤如血，如浓茶。……初六日，忽中郎室中老姬呼予入内云：“夜中便三四次皆血，几昏去，得不便则可望活。”予私自哭泣，安慰之，急呼李医至，切脉曰：“脉脱矣！”予顿足仆地。医曰：“勿惊，且试人参汤。”已进参，顷之气喘，自云三分生，七分死矣。已复起便，自云：“我略睡睡。”此外绝无一语，遂坐脱去，予呼之不醒矣！<sup>[3](P1209—1210)</sup>

从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六日的日记，不仅记述详尽，且叙事精要简洁，延请李医之后，又请了陈医，两人都说：“无病。”短短四百余字，竟然五次提及便血，并具体描写其情状。这些重复，给人强烈的感官刺激。人物问答都异常简练，有如白描。“我略睡睡”一语，竟成为一代文学大师的临终遗言，百代之下，读之令人泫然。中郎死后，小修抒发了自己作为亲历者的感怀：“一朝遂失仁兄，天地崩裂，以同死为荣，不愿在人世也。”手足情深，中郎与小修年龄相若，性情相近，见证兄长的英年早逝，对小修的打击之深，可以想见。此语绝非俗套，而是真性情的流露。小修对中郎感情太深，以至中郎死后，还多次出现在小修梦中，更加感人：

是夜，梦与中郎会于一楼，中郎看二人奕。予问曰：“兄住此乐乎？”中郎曰：“甚乐。”予曰：“予即来此楼中，共聚首可乎？”中郎曰：“未可。”予问：“修行有益否？”中郎曰：“大有益。”予话间快甚，以手摩中郎身云：“甚暖，非逝者相也。”踊跃欲告人而醒。<sup>[3](P1232)</sup>

此段全用对话，表面毫无波澜，用词极其家常，而用手抚摸中郎的身体，发现竟然是温的，“踊跃欲告人”，梦和醒的边界就在此处。“欲告人”这个行为，恰恰给了美梦致命一击，醒来方才痛念无常，发现一起如梦幻泡影。字字平淡，又字字血泪，细细想来，万事到头皆是空，美好的事物总是不长久。这种梦魇，对每一个人的一生来说，恐怕都会不止一次地



出现吧。这正是小修叙事高明的地方,无招胜有招,无法之法,方是极境。日记体的优点是在时间的河流中不断徜徉,任何一部分截取出来,可能都是绝佳的叙事文字,而叙事的脚步不会因某个重要人物的离去而刻意停止,从而展现了更为丰富的日常生活风俗图景。围绕中郎之死,小修还为我们呈现了后事的处理,安慰老父亲,亲友的不断哀悼,等等。其中,描写年迈的父亲丧子之后的反应十分真切动人:“重九日,侍老父榻前,窃窥老父于无人处哭,见儿至即收泪,盖恐重儿之哭,并有性命之忧也。旦促予至沙市料理逝者事。”老父亲为了不让主丧的小儿子伤心,只能背地里哭泣。他晚年丧子,本来在这个时候应该更多地获得来自儿子的关怀,但他却毅然催促儿子到沙市料理中郎的丧事。一位坚强而可敬的老父亲的形象跃然纸上。而对于这位老父亲的病逝,小修没有,可能也不愿去过多地着墨。

《游居柿录》里更多地记载着好友们的一个个离去:陶石簪、钟减亭、李清邦、贺醇儒、李承烈、周盛祚、龚觉先、刘玄度等等。由于亲疏远近,自是感慨不同,但大多因情真而动人。如卷十记载刘玄度的去世:“晚渡江,将至岸,忽有一人大呼曰:‘刘玄度逝矣!’予惊问故,其人曰:‘玄度至沙市鬻妾,忽病数日,遂不起。’予大骇。会两舟相遇,去急,亦不暇问其人谁也。”描写自己是在渡船上听到刘玄度的死讯,事出突然,原因也颇为怪异,而且“去急,亦不暇问其人谁也”,颇有小说家笔法,在此埋下了伏笔。“予洒泪登岸,至寓即走唁之。旅舍荒凉,寂然一棺,予哭之无异兄弟也。”来到玄度停灵的旅舍,“寂然一棺”,伤感之中带有些恐怖的气氛。接着补叙了刘玄度的来历以及自己与他的交往:“玄度名芳节,别号恒沙。大有才藻,善谈论。与予为髫年交,举丁酉乡试第二。癸丑试卷已入彀,将登榜矣,而策中称誉江陵相公太过,其词殊激,竟掷去。其人旁通百家言,楚中异才也。无子,晚娶雷何思太史妹,甚悍;家有数妾,皆不得御。以无子故,至沙头买妾,欲以八月十八日纳妾,而十七日逝矣。病之前数日,屡招其居停主人云:‘袁三先生到否?幸为我觅之。’其人遍觅不得,去予到期仅两日耳,竟不及一言而别,惜哉!将至宜都,料理其嗣续及遗文,时方未遑也。”<sup>[3]</sup>(P1346~1347)至此,读者方才理解前面小修为何听到玄度死讯会如此惊讶与悲痛。三百余字的记述,在小修的日记中并不算很长,却纾徐有余韵。这种精巧的结构,不仅起到了引人入胜的效果,而且更好地抒发了作者对刘玄度的感情。在小修日记所载

的这些亡者中,最特别也最能体现小修关怀的是他笔下的两位仆人之死。一位是卷三里小僮盟鹭失脚踏水而亡,另一位是卷八中那位善于抄书的仆人阿伦的病死。前者因其“不良死”,更引起了小修持久的怀想与对生命的思索:

午后发舟,小僮盟鹭失脚踏浅水中,方持衣而笑,一转盼盘涡中不见矣,伤哉!……渡口兵船人云:“此地每年此月,即堕一人。”虽生死有定数,然悼念其不得正命而死,且孤其殷殷从我之意耳。是夜,不成寐。……自思天下事非吾力所能及者,吾亦将奈之何,大限到来,自己亦未必能保,况眷属乎?况奴仆乎?予瞻哭于几诗云:“生平忝闻道,梦幻讲已详。积药如丘山,临病更求方。”我之谓矣。然而死生常也,特悯其以不良死,不能无隐痛耳。……夜梦亡僮阿鹭来,貌颇不怡。予问之曰:“汝已死,今复来耶?”鹭曰:“我虽死,特来随侍。”予因曰:“死而不死,亦快人。”觉而自叹梦中之痴也。嗟乎!我非妇人之仁也。徒以飞鸟依人三千里外,一旦失去,真可伤悼。前在丹徒念幽冥之苦,欲于竹林寺中为施灯一年。寺中伽蓝为米元章,予欲作一疏告之,如亡魂可收,望老颠用为侍史。后以行忙不及,行至南都,当竟此念耳。<sup>[3]</sup>(P1159~1161)

僮仆盟鹭的意外身亡,给小修造成了不小的打击。这件事情不仅使他难以入睡,甚至在睡梦中,他也依然不能忘怀,更导致了他对生命主题的思考。他虽然一直试图用“死生有定数”,以及苏东坡的诗句来宽慰自己,但他仍然很难摆脱内心的自责:“徒以飞鸟依人三千里外,一旦失去,真可伤悼。”最后,他只好在彼岸世界为仆人盟鹭寻找一个出路——做米元章的侍史。面对亲亡友丧,有时现世的安慰远无法平复内心巨大的创痛,也只好泛舟弱水,以达彼岸。这是小修面对生命主题时为我们提供的第二种选择。

### 三、果报轮回之思

小修本来笃信佛教,又对道教颇为尊崇,有注解庄子的学术著作《导庄》存世。加之终生坎坷,科场不利,一身多病,亲朋凋落,对果报轮回深信不疑;但他的可贵之处在于,果报轮回在他笔下并未进行神秘化的处理,而是成为了一些精彩的叙事片段,逸闻轶事,怪怪奇奇,经小修之手,稍加点染,便被赋予了独特的个人色彩与感伤情韵。

小修笔下的果报故事,较为典型的是傅楚竹故事<sup>[3](P1308~1309)</sup>。故事讲傅楚竹偶然重病,冥冥中看到自己骑着一头大象来到一个地方。主事的人对他很有礼貌,问他生前是做什么的。他回答说是儒绅。主事的人说他阳寿未尽。骑象回来的路上,他遇到了亲家乔梅皋,其仪仗盛大,对他说:“亲家好去!”原来是新任岳神。醒来后他问家人,得知亲家新死。后二十余年得善终,去世时已经知道自己要到女娲皇宫里去作相了。这都是因为他居官清正,“终身无喜愠之色,疾言怒气不及奴仆。所居官皆膏脂地,而晚节食贫,无异寒士”所带来的善报。故事特别提到傅楚竹临终前说:“我素不信鬼神,非幻语也。”以增强其可信性。表面看来颇有迷信色彩,实际上想要表达的却是小修对生命问题的一种看法:广积“隐德”,多行善事,必会有好报,无论是在现世还是在来生。这点在他的几篇寿序中体现得尤其突出,诗歌如《书许翁册》《题宛陵吴思每尊公遗像》,散文如《寿安远令田近薇七十序》《寿懿所沉翁七十序》《徐乐轩樵歌序》等。然而寿序毕竟是为他人而作,有情真意切者,当然更多的是应酬之作,所谓寿序中的所谓“隐德”,未必出于真心的夸赞,只不过其人显德不彰,只好称颂其“隐德”罢了。轮回故事在小修这里无甚趣味,多是因袭民间旧套,讲述女子贞洁、男子忠烈的故事,唯有描写其兄袁宏道死后成神的一则日记颇值得玩味:

八月十四日,秀才周蕃卒。蕃未死之前一月,忽入冥,见一处门廡甚壮丽,问人,曰:“此袁星君住处。”入门,见堂上主者即中郎也,衣冠若云霞。亦有牙牌,作天篆。蕃见而拜中郎曰:“汝来耶?”蕃自叙:“有志青云,不幸夭折,惟先生救我。”中郎曰:“大凡作人要好。作人好者,即夭折亦自有佳处可往。汝却后一月始当命终,且还。”蕃曰:“先生何以住此处?”中郎曰:“我蒙上帝之命,检校人间文学,极费心力,数月内可竣事,亦当迁往他处矣。”言已,即令人送之出。顷之苏,至是一月矣,果卒。<sup>[3](P1321)</sup>

小修对先兄的怀念实在太深刻了,因而安排了这样一个梦境:借周蕃的眼睛,看到中郎在冥间的崇高地位,借周蕃之口,问出中郎现任职务;而中郎那句“大凡作人要好。作人好者,即夭折亦自有佳处可往”,正道出了小修对中郎在另一个世界里最美好的期许与祝福。其实,这种祝福又何尝不是送给天下早夭之善人的呢。逝者长已矣,生者如斯夫。将这种祝福作为麻醉剂,使生者更好地活下去,不失为面

对生命主题时的一种积极选择。

#### 四、聚散兴亡之感

聚散与兴亡也是生命意识最常见的表现之一。“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”,亲朋的聚散和历史的兴亡,都如同时间长河中的一股清流,虽远派千里,然终究要入于汪洋。袁中道的日记中,对这两个主题都有其独特的表达。

关于亲朋的聚散,小修最喜用“尔来二十又一年矣”“尔来十七年矣”“去今十三年矣”这一类的语句。抚今追昔,年华老去,青春不再的悲鸣与感叹,在其日记中俯拾皆是。兹举两例以说明之:

(先居)其左为嚶鸣馆,愚兄弟三人少年修业处,废沼荒台,日以零落。过邻五叔云泽舍,拜于先塋。今年觅数片碑石,封识其间。袁氏之兴,两制科相承,不满二十年,移居城市,东徙西迁,日不暇给,何皇及先人乌兆也哉!<sup>[3](P1276)</sup>

七月二十三日,龚静亭舅下世,不胜感伤。舅名仲安,河南布政龚春所公季子。少而美如冠玉,习儒业成,以诸生入太学。家世丰厚,又自能经营,起家巨万。然好创田产,务广大,故虽富而常窘迫。饮啖兼人,喜行乐,与中郎及予年相若,交甚暱。万历壬辰、癸巳间,外祖方健饭,诸舅及予兄弟皆住石浦。八舅鲜衣怒马,霍霍如得霜鹰。其后相继迁化,向年文酒赏适之侣,惟舅与予在耳。年来住居稍远,迹亦渐疏,偶闻其病,不知不起也,可叹!舅亦信佛法,随分作功德,能诗歌,以懒废。<sup>[3](P1314)</sup>

上面两段文字,第一段叙小修回乡祭祖,经过他们三兄弟少时曾一起读过书的嚶鸣馆,看到“废沼荒台,日以零落”,故地重游,不胜感慨。这本来就容易引起人事代谢的感慨,成为文人怀古的好题目。又说到袁氏家族因科举兴起,而移居城市,东西迁徙,连先人的祖坟都无暇顾及了。在安土重迁的宗法社会,这种境遇给小修所带来的心灵冲击自不会太小。而下一段追述小修的八舅龚静亭,与中郎、小修年龄相近,年轻时爱好繁华,也许袁家兄弟相仿佛。八舅“鲜衣怒马,霍霍如得霜鹰”的形象如此鲜明,如此活泼,一个少年才俊跃然纸上。行文至此,让人无限追怀当年。其实,众所周知,怀想美好的当年,自然是要为不得意的今天作铺垫,果然小修笔锋一转,“其后相继迁化,向年文酒赏适之侣,惟舅与予在耳”,没有人能逃脱自然规律,时间是最温情而又最无情的标尺。“惟……与予在耳”这种句法,小修还曾多

次使用过。向年诗酒朋友,风流云散,作为后死者,每念及此,便有无限的痛楚在,因而感情至深。至于历史的兴亡之感,在小修这里与古人无别,也会在游历名胜古迹的时候抒发;然而与众不同的是,小修的兴亡之感主要是通过考据名物来抒发。谙熟历史的小修,每到一地,都会事先查看当地的典籍与方志,以备对地方掌故的考察。如著名的诸葛亮隆中“在襄阳不在南阳”,苏轼误解赤壁所在地,以及“方城”与“万城”之辨,都很能见出小修考据的功夫来。而一些考证中,同样能体现出他从历史中生发出来的现实关怀,如其对颜真卿的评价:“考之颜真卿守平原说云:‘古之任人,无内外轻重之异。故虽汉宣之急贤,萧望之之得君,犹更出治民,然后大用。非独历试人材,亦以维持四方,均内外势也。’唐至中世,重内轻外,大臣非以罪不出守郡。虽藩镇帅守,亦以不如寺监僚佐,故郡县多不得人。禄山之乱,河北二十四郡,一朝降贼。独有一颜真卿,而明皇初不识也。此重内轻外之弊,可不为鉴哉!”<sup>[3](P1398)</sup> 颜真卿作为安史之乱中的大忠臣,有节操的大书法家,历来受到文人的表彰与褒扬,陈陈相因,以至于冗滥;而小修并未表彰其忠诚与善书,而是称赞其识见,“此重内轻外之弊,可不为鉴哉!”很明显指向了当时的晚明边患频仍,党争不止的腐败政局。将对历史兴亡的空疏感叹转化为以史为鉴的真知灼见,这种现世关怀,时至今日,仍值得我们激赏效法,同时也为我们在面对生命主题时提供了另一种可资借鉴的范式——读史使人明智,将空疏的感伤化为实际的学问。读史使人明智,考据可以疗毒。

小修在中郎去世的那年除夕夜里“得二绝”,其内容我们不得而知,但一定是伤心欲绝的。“伤逝者之捐弃,肠痛不可喻。”他对他的朋友度门说:“今年受生人之苦,骨肉见背,受别离苦,一也。功名失意,求不得苦,二也。自归家来,耳根甚不清净,怨憎会苦,三也。秋后一病,几至不救,病苦,四也。生人之

趣尽矣!”四苦并作,小修心境之差可见一斑。然而度门在此处给予了他当头棒喝:“不如是,居士肯发此勇猛精进心耶?”<sup>[3](P1222)</sup> 从广义上讲,任何叙事,只要将叙事时间拉得足够长,其终点都将会是死亡。这是生命意识萌发的根源。没有死亡的恐惧与威胁,人类哪里会思考生命的价值与意义。人生的苦难无法避免亦不可逃避,小修为我们提出的问题今天仍摆在那里:宗教能够帮助人离苦得乐吗,宗教能够出离生死吗?小修没有明确回答,也许他没有思考清楚,也许这正是他的明智之处。

《游居柿录》最积极的意义在于将个体生命的苦难描摹得淋漓尽致,引发后人奋起“疗救”<sup>[4](P3782)</sup> 的进取心。毕竟,“疗救”他人,便是“疗救”自己。值得注意的是,小修私人写作中呈现出的毫无掩饰精神痛苦,在此前的文学传统中是不多见的。究其原因,除了公安派性灵主张外,最根本的是在晚明“王纲解纽”的末世之中,有志士人的普遍困顿与抱负难伸,因此,《游居柿录》可以作为研究晚明士人精神生活史的一手材料来使用。如果我们将眼光扩展到整个明清文学,袁小修两百年之后的吴敬梓在《儒林外史》中曾说道:“一代文人有厄。”<sup>[5](P13)</sup> 这句话甚至成了小说的主旨。《游居柿录》和《儒林外史》虽然在文体与表现手法、内容上皆有很大区别,但在表现士人精神世界的困顿与没有出路方面则是一致的。生命的困顿是一个深刻而久远的叙事传统,时至今日,仍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。

#### 参考文献:

- [1]周作人.雨天的书[M].上海:北新书局,1925.
- [2]钱伯城.袁宏道集笺校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.
- [3]袁中道.珂雪斋集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9.
- [4]鲁迅.鲁迅全集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5.
- [5]吴敬梓.儒林外史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0.

责任编辑 韩玺吾 E-mail:shekeban@163.com